

南宋官窯「寶用」銘瓷及相關問題



余佩瑾

近年來因為位於中國浙江省杭州市老虎洞窯的考古發現，(註一)使得南宋官窯再度成為熱門的研究主題。學界論述多半從出土標本與文獻記載之間的關連性出發，嘗試透過實物來連結南宋《坦齋筆衡》和《負暄雜錄》中關於南宋官窯的記載。即老虎洞窯是不是正好反映：「宣政間，(政和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中興渡江，有邵成章提舉後苑，號邵局，襲故京遺製，置窯於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窯。澄泥為範，極其精緻，油色瑩澈，為世所珍。後郊壇別立新窯，亦曰官窯」這一段文字

中關於「襲故京遺製，置窯於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窯」的敘述，學界的這一分期待似乎也從刻有「修內司」銘蕩箍在老虎洞窯址的發現，而進一步獲得確認。(註二)儘管如此，環繞在老虎洞窯周遭的相關議題，如北宋官窯的真正面貌為何？究竟是汝窯還是張公巷窯？(註三)北宋官窯與老虎洞窯之間的關係為何？(註四)老虎洞窯和郊壇下官窯之間的關係又是什麼？以及老虎洞窯的窯址是否也存在於時間轉變而遷移至不同地點的可能性，(註五)出土的標本是否也可以從中加以分期等，(註六)都是因應老

虎洞窯的發掘，而陸續成為研討會中的討論議題，或是舉辦相關展覽所想要加以詮釋的面向。(註七)

本文所要談論的「寶用」銘瓷，同樣也是想要透過考古發掘所出土的新材料，來思考「寶用」銘瓷器的可能定年及使用脈絡。所謂「寶用」銘瓷，是指器底存在以近似墨彩或褐彩書寫「寶用」兩字銘的瓷器而言。根據筆者目前所掌握的資料顯示，傳世「寶用」銘瓷共計有四件之多，其中三件皆作十六瓣花口碟的器形，且底部均具有六枚支燒痕，及支點處露出黑灰色胎土的特徵。這三件中兩件口



圖一 南宋~元 官窯「寶用」銘碟 (故瓷867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南宋~元 官窯「寶用」銘碟 (故瓷8675)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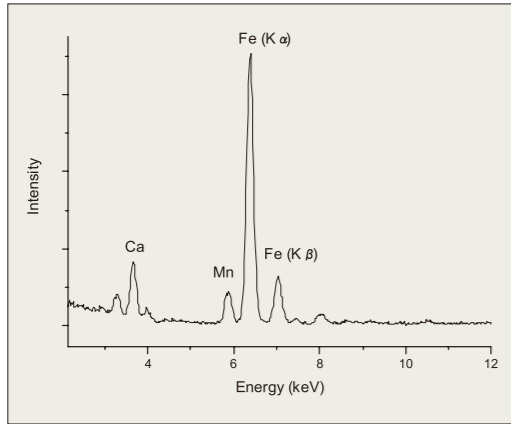


圖三 南宋~元 官窯「寶用」銘碟 大英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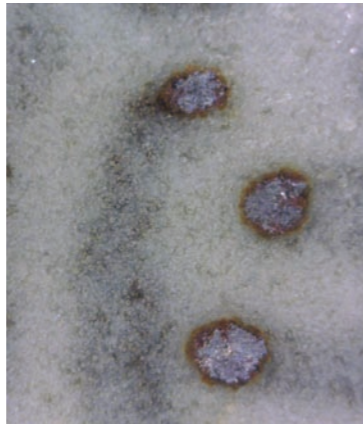
沿嵌金屬釘的「寶用」銘瓷碟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圖一、圖二)。而另外一件口無嵌銅釘者原為英國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以下簡稱PDF)的典藏，但自二〇〇七

年PDF關閉以後，已成為大英博物館的收藏(圖三)。這三件「寶用」銘瓷碟，因器形與支燒痕等外觀特徵皆相似，故應為同一時期的作品。特別是考慮到英國大衛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一八九二~一九六四)收藏瓷器，有一大部分購買自上海鹽業銀行，也就是當年慈禧太后或溥儀自清宮提出抵押給鹽業銀行的文物。在此背景下，大英博物館收藏的「寶用」



圖八 南宋~元官窯「寶用」銘碟（故瓷8672）「寶用」銘字跡經XRF分析。其鐵(Fe)含量較周圍的釉（無字部分）高，且並未測出鈷(Co)成分，可判定字體部分其原料主要是含鐵氧化物



圖七 南宋~元官窯「寶用」銘碟（故瓷8672）顯微照片。

將「寶用」銘瓷碗，視為是宋朝之物。（註八）而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的「寶用」銘瓷碟，最早發表於《故宮

Eunortopoulos 收藏所編寫的圖錄中，

在此之下，老虎洞窯的考古發掘材料究竟可以提供什麼樣的定年參考依據呢？雖然老虎洞窯址中不見寫有「寶用」銘的標本，但是從中出土的「官窯」銘標本，卻又提供另一個值得檢證和思考的方向。杭州老虎洞窯出土兩件底書褐彩「官窯」銘的碗底標本，因出土層位共伴有帶八思巴文銘支燒具，和造型與元青花高足杯類似的青瓷高足杯，故在該一地層被

藏瓷》南宋官窯專輯中，後來也被蔡和璧收進一九八九年出版的《南宋官窯》特展圖錄中。（註九）一九七五年，香港東方陶瓷學會舉辦「中國青花瓷」展，策展人毛文奇在圖錄的序文中，同時論及臺灣與英國典藏的「寶用」銘瓷碟，而以為它們是南宋的作品。特別是對於碗底看似墨彩的「寶用」兩字銘，毛文奇接著也提出其釉彩中是否含有鈷的問題，須做進一步化驗方能確定。（註十）倒是，Stacey Pierson 在一九九九出版以介紹PDE典藏的圖錄中，則將大英博物館「寶用」銘瓷碟的產燒時間，定於十三至十四世紀之間。（註十一）

類似的青瓷高足杯，故在該一地層被

視為是所謂元代層之下，兩件燒造品質較為粗糙的「官窯」銘碗底標本，遂有產燒於元代的說法。此同樣以近於篆書體例書寫於外底心，且釉下褐彩成分經化驗係為含鐵氧化物的「官窯」銘二字，由於和「寶用」銘近似，故讓人產生「官窯」和「寶用」兩者，是否共同反映出一個窯廠以款識作為識別的標記（圖六）。據此回頭檢視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的兩件「寶用」銘瓷碟，發現在顯微鏡下，也能清楚地辨識出「寶用」兩字書寫於釉下的情形（圖七）。而書寫的顏色，經本院登錄保存處陳東和先生使用可攜式XRF儀器檢測，也發現這兩字銘字跡所在處，釉中含鐵的現象較周邊無字處為高，而且從中並未測出含鈷成分；因此幾乎可據以推論「寶用」銘瓷碟底部的「寶用」兩字，主要是以含鐵氧化物書寫而成（圖八）。此一檢測結果似能更進一步說明，傳世「寶用」銘瓷當與老虎洞窯址所出「官窯」銘標本一致，共同呈現出官窯產燒以含鐵氧化物在外底書款以作識別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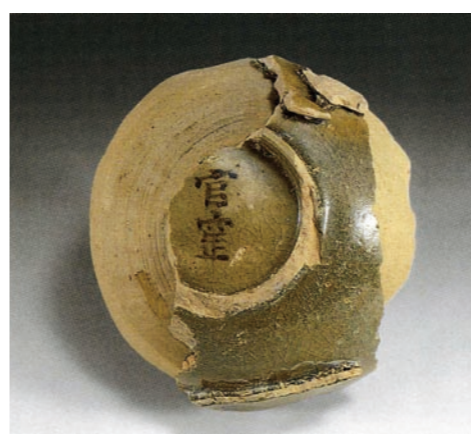


圖四 南宋~元「寶用」銘青瓷碗 大英博物館藏



圖五 南宋~元 哥窯青瓷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銘瓷碟，極有可能和本院藏品一樣，原來同屬清宮舊藏的一部份。至於，另外一件「寶用」銘瓷碗，最初為一九二〇年代英國東方陶瓷學會的創辦人之一（George Eunortopoulos 一八六三~一九三九）所擁有，後來賣給大英博物館成為該館的典藏。此件「寶用」銘六瓣葵花口碗，底心同樣可見褐彩書寫的「寶用」兩字銘，且其器形與所謂傳世哥窯碗極為相近（圖四、五）。前述無論是「寶用」銘瓷碟和「寶用」銘碗，從它們外底心所共同存在，均作



圖六 杭州老虎洞窯址出土「官窯」兩字銘碗底殘件



篆書體例的「寶用」銘看來，這四件具有共同標記的作品，或許也擁有相似的產燒背景及使用脈絡。關於四件「寶用」銘瓷的定年觀點，一九二六年 R.L.Hobson 為 George



圖十四 南宋~元 官窯青瓷花式洗（故瓷866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五 南宋~元 官窯青瓷花式洗（故瓷1714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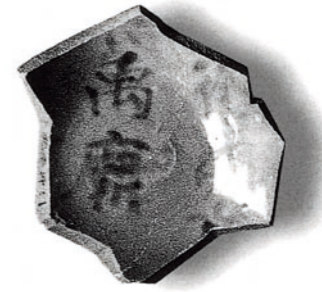
那麼另一件「實用」銘瓷碗的產燒年代又是什麼時候？誠如前文所述，由於該碗無論在器形和釉面開片特徵上，皆與一般所謂傳世哥窯器相近，加上老虎洞窯址中的所謂元代層，曾出土一些和傳世哥窯器相似的標本，故又被看成是傳世哥窯的窯址或元人孔齊《至正直記》中所記「哥窑洞窯」的可能產地（註十）。在此之下，此件「實用」銘瓷碗似亦無法排除其產燒於元代的可能性。雖然如

花花卉紋碟（圖十二），因可於四川彭州窖藏中，找到與之相似的金銀器（圖十三），而反映出流行於南宋官窯中的金屬器造型風格。而傳世同樣具金屬器形風格，且花口形制與「實用」銘瓷碟相同，均作十六瓣狀的南宋官窯青瓷花式洗（圖十四），因器表釉狀沉和燒後呈色，以及底部出現的五枚圓點狀支痕，不僅和南宋官窯青瓷花式洗（圖十五）相近，同時又因與之相似的器形也出土自老虎洞窯所謂的元代層中，故間接反映出三件「實用」銘瓷碟可能產燒於南宋至元的現象。

事實上，以含鐵氧化物在器物上書款，也不始自於老虎洞窯。若追溯浙江青瓷產燒脈絡，同樣亦能在唐代越窯青瓷作品組群中發現相似的裝飾手法。如慈溪出土帶「禹廟」銘碗殘件（圖九），即是同樣以含鐵氧化物書款的例證。而出土自臨安縣明堂山



圖十 出土自臨安縣明堂山唐天復元年（901）水邱氏墓出土的褐彩器



圖九 慈溪出土帶「禹廟」銘碗殘件



圖十一 「官窯」銘支燒具 臺北述鄭齋藏



唐天復元年（九〇一）水邱氏墓的褐彩器（圖十），則提示以青瓷釉下褐彩為飾的可能脈絡。至於，傳世「實用」銘瓷是否如同老虎洞窯址出土的「官窯」銘標本一樣，可視為產燒於元朝呢？關於此，臺北述鄭齋典藏帶「官窯」銘的支燒具，倒是提供另一



圖十二 南宋 官窯青瓷劃花花卉紋碟（故瓷1396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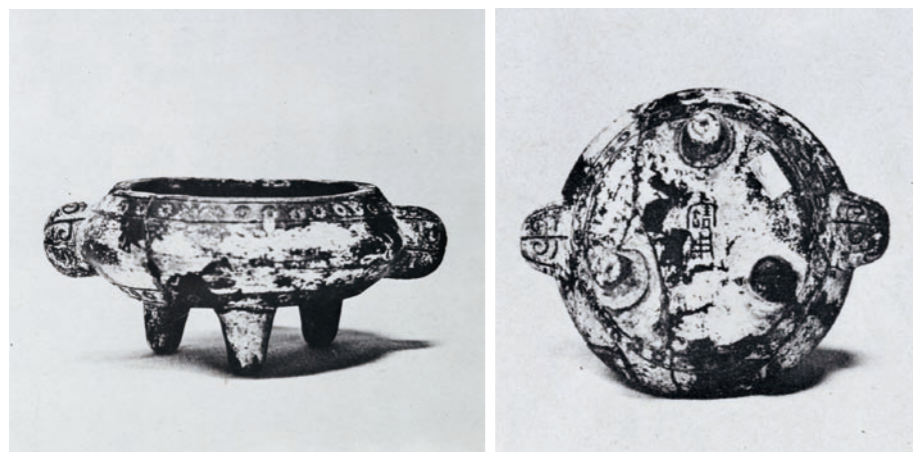


其次，若就器形來看，作十六瓣花口狀，週壁極淺，平底，矮圈足造型的「實用」銘瓷碟，由於明顯地呈現出宋朝瓷器常見的金銀器造型風格，故也無法排除其與南宋官窯所存在的關係。以本院典藏品為例，器形作十二瓣花口造型的南宋官窯青瓷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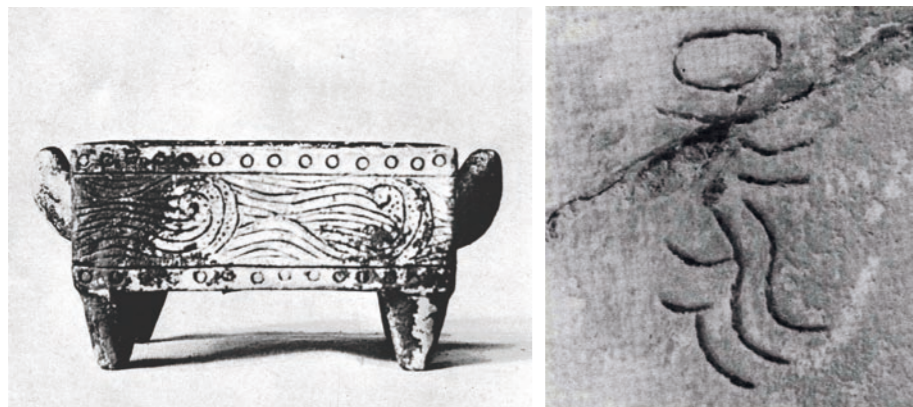
銘瓷產燒於南宋至元的可能性。個較具彈性的斷代參考。述鄭齋典藏的支燒具出土自杭州卷煙廠附近，和老虎洞窯址所見南宋至元支燒具相似，在不帶支點的反面可見以含鐵氧化物書寫而成的「官窯」兩字銘（圖十一），此一標識的存在，除再次顯現老虎洞窯有以「官窯」作為器物和支燒具識別標記外，亦提供「實用」



圖十三 四川彭州窖藏金銀器 彭州市博物館藏



圖十八 黑陶雙耳三足爐，外底心刻有「寶用」兩字銘 國立臺灣博物館藏



圖十九 黑陶方形爐，外底心刻有「子子永」三字銘 國立臺灣博物館藏



圖二十 西周 師湯父鼎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二十)。但另一方面，此類具有永世珍藏、使用意涵的「寶用」銘和代表後代子孫的「子子孫孫」銘的存在，究竟賦予一件器物什麼樣的意涵，以及藉此傳達出什麼特殊的訊息呢？依據小林茂的研究，青銅器所見「寶用」銘，可從主人究竟為誰？而加以追朔帶「寶用」銘

器物的傳佈脈絡。也就是說，如果主人是鑄造者本身，那麼一件帶「寶用」銘的器物，自然傳遞鑄造者希望永世珍藏使用該件文物的含意。如果主人是子子孫孫，那麼該件「寶用」銘器物，當是鑄造者期待後世子孫能夠永遠珍藏使用的含意。同樣地，如果銘文中含有主人

贈與他人的含意，那麼一件帶「寶用」銘的器物，則反映出鑄造者希望收受者或他的後代子孫能夠珍藏使用的含意。比較特別的是，如果一件「寶用」銘器物有當作嫁妝的用途，那麼這件「寶用」銘作品，當具有傳播至他處珍藏使用的意思。(註十五)

此，浙江湖州皇墳山宋墓出土疑似南宋官窯的六瓣葵口碗(圖十六)，因器形和足底露胎的做法上，和傳世「寶用」銘瓷碗存在幾分相似性，同時，與六瓣葵口碗共伴出土的建窯黑釉茶盞、景德鎮青白瓷以及一件看似龍泉窯仿官的青瓷把杯等(圖十七)，(註十三)其個別產燒時間又皆不會晚於南宋。故也間接說明即使「寶用」銘瓷碗有可能產燒於元代，但因存在與皇墳山宋墓出土品的相似性，故可從中據以推斷其產燒時間亦應為南宋至元，即十三世紀至十四世

紀之間。
綜上所述，透過老虎洞窯址所發現的新材料以及傳世、窖藏和墓葬所見文物相互比對後，本文論述的四件「寶用」銘瓷應產燒於南宋至元。至於與之相關的使用脈絡問題，若探就器底同樣出現「寶用」銘的陶瓷器，則發現國立臺灣博物館也典藏兩件看似與之有關的黑陶器。其中一件作雙耳三足爐造型，外底心刻有「寶用」兩字銘(圖十八)，而另一件雙耳方爐的外底心，則刻有「子子永」三字銘(圖十九)。(註十四)由於這兩件

作品的器形皆反映出襲仿自青銅器造型的特徵，且其器底存在的「寶用」與「子子永」字銘又均可連結至西周青銅器鑄銘中常出現的「子子孫永寶」、「子子孫永寶用」或「子子孫永寶用」等銘款，遂讓筆者以為此類帶「寶用」銘陶瓷器的使用脈絡，或也和青銅器相關？
以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典藏為例，確實可於西周晚期的青銅器中，發現多件鑄刻有「子子孫永用」、「子子孫永寶用」和「子子孫孫永寶用」銘的作品，其器形亦包含有三足圓鼎形器(圖



圖十六 浙江湖州皇墳山宋墓出土疑似南宋官窯的六瓣葵口碗 湖州博物館藏



圖十七 皇墳山宋墓中出土龍泉窯仿官青瓷把杯 湖州博物館藏

註釋

1. 參見杭州市文物考古所，〈杭州老虎洞南宋官窯址〉，《文物》2002年第10期，頁4-31。
2. 參見唐俊傑，〈關於修內司窯的幾個問題〉，《文物》2008年第12期，頁61-68。和崔劍峰等，〈杭州老虎洞窯址出土“修內司窯”銘瀉盞的化學成分分析〉，《文物》2009年第12期，頁87-91。
3. 參見伊藤郁太郎的研究，最新一篇是〈北宋官窯的譜系〉，收錄於2010年9月北京故宮博物院所召開之研討會會議手冊中。見古陶瓷研究中心，〈故宮博物院南宋官窯及官窯制度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2010年9月。
4. 參見杭州南宋博物館，〈南宋官窯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北京大學中國考古研究中心、杭州市園林文物局，〈南宋官窯與哥窯-杭州南宋官窯老虎洞窯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5；北京故宮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故宮博物院南宋官窯及官窯制度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2010年9月。
5. 參見李喜寬，〈有關南宋後期官窯的幾個問題〉，《北京故宮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3期，頁6-23；李喜寬，〈南宋前期官窯新探〉，《東方博物》第35輯，頁26-35。
6. 參見范夢園，〈杭州老虎洞窯址南宋遺存分期研究〉北京：北京大學文博考古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04年；以及森達也，〈杭州·老虎洞窯出土青瓷の編年について〉，《愛知縣陶磁資料館研究紀要》15，（2010年3月），頁69-94。
7. 2010年10月之際，除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舉辦「文藝紹興—南宋藝術與文化特展」展出幾件南宋官窯外，中國的北京故宮博物院、杭州歷史博物館，日本根津美術館、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亦各自推出以宋代官窯為題的展覽，並出版展覽圖錄。
8. R.L.Hobson, *The George Eumorfopoulos collection.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Korean and Persian pottery and porcelain II*, (London: Ernest Benn, LTD., 1926), p.17.
9. 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共同理事會編，〈故宮藏南宋官窯〉（香港：中華開發公司，1962），圖29，頁64；以及蔡和璧，〈宋官窯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9），圖版132-133。
10. 毛文奇，〈中國青花瓷器展覽及同類型的釉裡紅〉（香港：香港博物館，1975），頁17。
11. Stacey Pierson, *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Ru, Guan, Jun, Guangdong and Yixing Wares in 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London: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99), p.47.
12. 杜正賢主編，〈杭州老虎洞窯瓷器精選〉（北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頁16-17。
13. 此件甚受矚目的青瓷把杯，過去曾有徘徊在南宋官窯和龍泉窯仿官之間的疑義，對此，筆者亦深感不解。不過有幸參觀過述鄭齋所藏瓷片標本之後，因其胎袖特徵皆與述鄭齋所見龍泉窯採集標本相似，故筆者同意朱伯謙等人的觀點，視該件作品為龍泉窯仿官。
14. 相關說明參見臺灣省立博物館，〈館藏陶瓷圖錄〉（臺北：臺灣省立博物館，1981），頁88-89。
15. 小林茂，〈商周金文の「宝用」の主体と「其」の意味について〉，《人文科學》（大東文化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第13号（2008年3月），頁275-332。
16. 參見陳芳妹，〈再現三代—從故宮宋代仿古銅器說起〉，《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0），頁293-320、413。
17. 陳芳妹，〈再現三代—從故宮宋代仿古銅器說起〉，頁293-320、413-414。
18. 參見秦大樹，〈宋代陶瓷禮器的生產和生產機構〉，《文物》2005年第5期，頁64-95。但唐俊傑則以為南宋官窯乃是供御器物非作禮器、祭器用。見唐俊傑〈祭器、禮器“邵局”—關於南宋官窯的幾個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6期，頁45-60。

由此可知，無論具有「寶用」含意字銘的器物，其主人究竟是誰？或因存在永世珍藏的意涵，故多半有做為祭器使用的功能。以此回顧南宋遷都臨安之際，在許多宮廷禮器相繼喪失殆盡之際，陶瓷器確曾暫時補充青銅禮器成為祭祀的主體。此點可從老虎洞窯和郊壇下官窯皆出土仿銅造形的瓷器而進一步獲得確認。（註

十八）儘管如此，由於本文所論述的「寶用」銘瓷產燒於南宋至元，在時間點上似未能將之直接置於南宋朝廷使用陶瓷祭器的脈絡下來理解，而只能看成是深受此一潮流脈絡影響下的產物，至於面對此一現象，可不可以再將之視為是南宋至元之際，所逐漸興起的另一波復古風尚，則有待日後研究進一步證實。（本文曾於北京故

宮博物院舉辦之「宋代官窯與官窯制度」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寫作期間承蒙國立臺灣大學謝明良教授指導，同時也受惠於國立故宮博物院沈建東、陳東和、游國慶、朱林澤等同仁，和英國大英博物館 Cecilia Harrison、三女士，以及臺北述鄭齋私人收藏許多協助，謹誌謝忱。）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然而，相對於青銅器銘文所存在可以加以追溯、考證的前後文脈絡，陶瓷器上所見「子子永」和「寶用」字銘雖然較為簡單，但從其字義上確實也無法排除它們也具有永世珍藏的含意。在這個狀況下，如果思考南宋高宗對於北宋徽宗朝禮制不僅曾經想要加以復興，同時也進一步前溯三代古制，更為鋪張誇大的作為，而能夠從政和鼎和紹興豆互為關聯的使用脈絡，以及南宋以陶瓷作為祭器的背景中，為傳世「寶用」銘瓷鋪陳出可能的使用狀況。

首先，以商後期鼎作為範本而鑄造完成的北宋政和鼎（一一一六），雖然器表紋飾始終拘泥在仿商風格的窠臼中，但銘文字體的鑄刻上已充分展露出北宋的新意。（註十六）由於該件作品是北宋徽宗賞賜給寵臣童貫以作為家族祭器的文物，因此在銘文結尾處出現有「以祀其先，子孫其永保之」的銘款（圖二一）。就銘款的內容以及其中所包含對於收受者的期勉，甚至擴及至他的後代子孫的表達方式，確實符合前述小林茂對西周「寶用」銘銅器的觀察面向，而呈現

出足以和三代相連結，具有永世珍藏「寶用」器物，流通於北宋情形。至於，另一件從銘文內容而得知是南宋高宗賞賜秦檜以作為家廟祭器的紹興豆，鑄刻於器表「唯予永世用享」的字銘（圖二二），不僅透露出鑄造者冀望收受者及其後世子孫永世珍藏使用，同時從整件作品流露而出的仿周風格，和器表圓渦紋的處理上，也呈現出南宋高宗承襲北宋徽宗之後，力求再現三代（註十七），以讓帶「寶用」含意字銘的器物持續使用於南宋的情形。



圖二一 北宋政和鼎（1116）（中銅43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二 南宋紹興豆（中銅101）及「唯予永世用享」字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